

「回到未來」的文學史

● 王建元

首先，我認為「現代史」這三個字嚴格說不能成立。理由是我們每一個在世的人都處身於現代，但我們又妄想替現代作史，將還未過去的變成歷史。究其由來，是因爲二十世紀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叫「現代主義」，它的怪在於人類每一世代都是現代人，卻只有在二十世紀才出現了現代主義，而更怪之處，便是繼此之後更有所謂「後現代主義」了。現代人創立了後現代，這可以算是本世紀一偉大發明。我在不久前才知道中國大陸將大約1949年前的文學叫現代文學，將以後的叫「當代」。這倒也是一個辦法；其實當代的「當」也就凸顯了人與時間一種對峙的緊張關係。只不過現代史家們不只逐漸忘記了這樣劃分時序基本上有其權宜之處，更忽視了它背後那現代人對時間的焦慮不安而企圖超越它的情意結。

我當然不是要否定現代文學史的成就；我只希望提醒史家們，歷史的發展並不是單向地從先一個時代到後來另一個時代的。說起來近年大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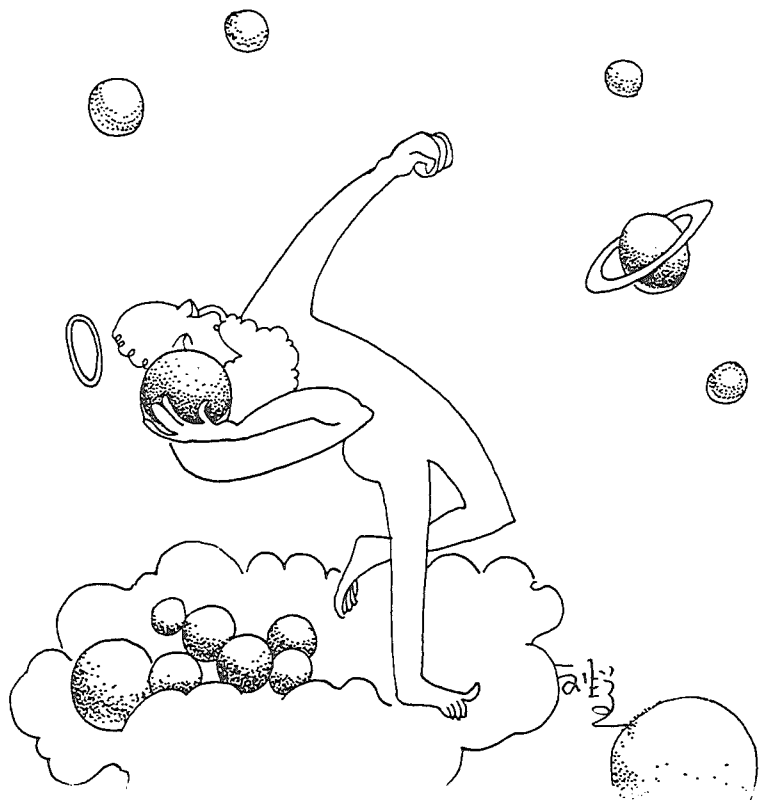
歡迎的《回到未來》*Back to Future*這套科幻電影，很可能會對文學史家提供一個新的研究門徑。科幻本來就是唯一能將未來放置在歷史的向度上講故事的文類。電影敘述主角因偶然機會到達「過往」，發現了將會嚴重影響他的「現在」的重重危機，故此憑着他的「現代」的意志，千方百計更改已經發生的史實。最後回返未來（其實就是現在，因爲現在就是過往的未來），享受到努力改史的成果。姑勿論這電影情節的科學意念在理論上似是而非，但啟人深思的卻是歷史的確可以由未來改造，進而使人明白到所謂史實也只能取決於現在的種種動機這一事實。我認爲文學史家們應該面對繼而接受這事實，回頭檢視以「倒逆時序」爲基本向度來整理文學史料的可能性。

劉再復最近在〈文學史的悖論〉一文中也用了「逆時序」這詞作爲文學歷時性的其中一種「悖論」。可惜他的所謂逆時序，實指「突破現實時間的障礙重新回到前代的審美精神形式

中」，並沒有顧及史家由於着眼於未來，而以一己祈望的心態，從現在的標準、方法、審美價值、意識形態等等來締造過往這種奇特的逆時運作。其實一切的文學運動或分期在某一程度上是由後者創造前者。例如中國文學史中的「初唐」、「盛唐」、「晚唐」等固然是傳統一貫的分期法，但從這逆時性的角度觀之，實質上又可以是晚唐回頭締造盛唐，盛唐又造就了初唐。這是因為有了盛唐，初唐這觀念才會出現，而觀念與它指涉的實質是一相互隸屬的整體。然後盛唐之能夠有「盛」這情況，又只能由晚唐及以後才能被創立和認定。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可以說是近代最好的一個實例來說明以上這個「倒過來」的文學史觀。白話文分明是二十世紀中國的產品，但胡適卻明目張膽地宣稱「白話文學史其實是中

國文學史」，然後「認定」《史記》、《漢書》、樂府、以至佛書等有很多白話（請注意「認定」所包含的所有史家那一廂情願，同時又具自戀情結的主體陳述性）。胡適這個創造歷史的活動明顯地指出他個人當時對白話文因先有了某種期望，然後才從古籍中尋求支持他的觀點的材料，希望白話文這運動將來終能普及全國。問題是胡適對自己這「造史」活動沒有任何自覺性。雖然在自序中他數次提到曾經「徹底的修改」，甚至將「原稿全部推翻」，但仍執迷於那終極而具「形而上存在」的歷史真相。他這個例子也就代表了史家們普遍的陷足於一個自相矛盾的困境。他們一方面認識清楚歷史必須改寫，但另一方面卻迷信於客觀歷史真相的存在。故此自己所寫（改寫）的往往是真理所在，以後也不容更改。



這個回到未來的史觀的哲學支柱，當然便是被視為現代詮釋學的核心精神的「詮釋循環」這觀念了。就怎樣從文學作品中獲得意義而言，這觀念解釋了由於讀者在閱讀時，因主體性的涉入參與而跟作品建立了一種主客共同隸屬的相互性。而被譽為「二十世紀的一個不向要超離時間這誘惑屈服」的哲學家海德格，也曾在他的《存有與時間》闡明了過去與現在的相互連鎖和不斷自我脫離朝向未來這個循環現象：

所謂真純的未來性，便是存有的現今存在亦同時是曾經存在。而曾經存在的特性在某種情況下是由將來所締造的。

中國文學中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為以上作證。宋歐陽修在〈峴山亭記〉中提起前人羊祜「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緣自羊祜當初「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山也」的喟嘆。在峴山上的歐陽修之存在無可避免地是結合了前人羊祜的存在；而同樣地，傷喟中的羊祜的存在也只能建立於後人歐陽修對他的回顧。換言之，沒有羊祜當然沒有歐陽修那句話，但沒有歐陽修這回顧「曾經存在」，也不能有我們今天所認識的羊祜。將這論點推而廣之，李白之能作詩，非經過多少先設的文學批評觀念與作品所影響不可。另一方面，我們現在的所謂李白這個人，他的詩，又都由自他以後的一點一滴對他的品評在時光之流中累積的創造。從這角度看，若我們說蘇東坡締造李白，貌似荒誕，但卻也不無詮釋循環的深意。

現代史家首先應對「現代史」這觀念提高警覺，徹底承認現代主義那冀求超越歷史的時序性終究是一虛幻妄

想，隨着回頭以時序的基本結構為最終憑藉，不妄求佔據一個在歷史的盡頭觀察它的運作的超離時間、游移於虛無飄渺中的特權地位，所謂一部回到未來的文學史，便是史家能一方面滿足於回到時間的往復循環的整體中，同時又具備自我反省意識，徹底接受在循環當中的逆時性，然後撰輯一部倒過來，詳盡解釋以現今的我用甚麼標準架構來塑造一部所謂「已經發生」的「史實」的文學史。另一方面他們又得經常提醒自己，寫歷史這行動本身就是創造歷史，同時寫歷史的人也只能是歷史的一部分。我認為所有現代人撰寫的歷史就是現代史；所有文學史家的著作便都是現代文學史。但由於對時間的敏感度特高為二十世紀現代主義的一大特徵，我們應該將「現代史」這詞的意義和用法提昇到另一個理論層次：它不再是執迷於將還未過去的變成歷史的「現代的歷史」(modern history)，而是充分說明另一個寫史的活動，它就是現代史家深徹體認到現今這時代與時間形成了一特別緊張的關係，然後相應地進行一種「史化」(The modern historizes) 這個活潑而又不斷演化的活動。

王建元 廣東人，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比較文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講師，此前王博士曾任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文學系客座講師，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著有《現象詮釋學與中西雄渾觀》等。